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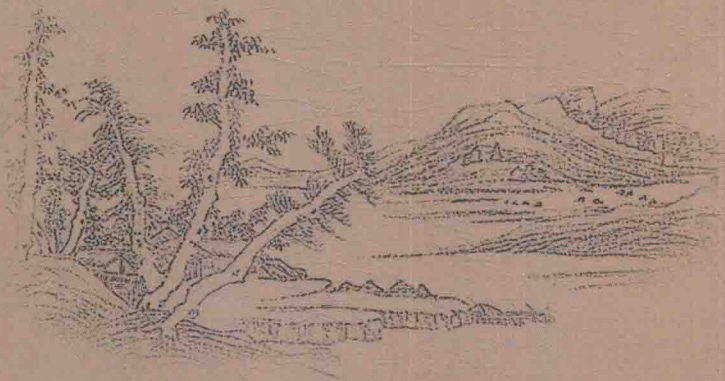


朱人求 主编

# 朱子新探

## ——朱子学与泉州文化研究

林振礼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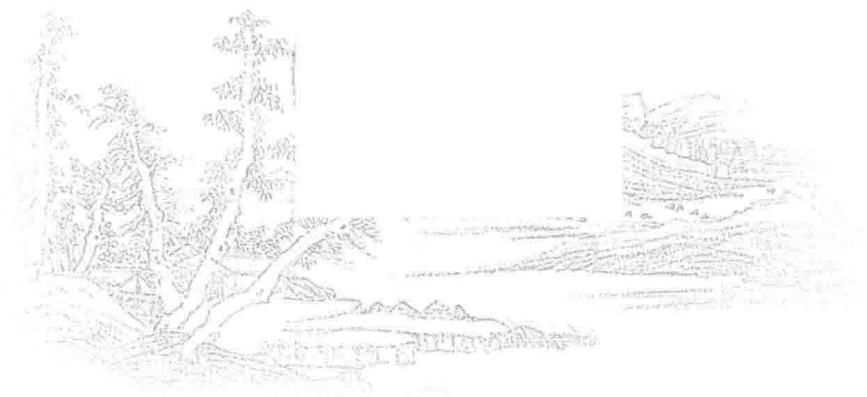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朱人求 主编

# 朱子新探

## ——朱子学与泉州文化研究

林振礼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新探:朱子学与泉州文化研究/林振礼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朱子学文库)  
ISBN 978-7-100-15788-9

I.①朱… II.①林… III.①朱熹(1130—1200)—哲  
学思想—研究②地方文化—研究—泉州 IV.①B244.75  
②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916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朱子新探:朱子学与泉州文化研究

林振礼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788-9

---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6 1/2

定价:78.00元

江西省 2011 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  
泉州师范学院中国史学科资助项目

# 《朱子学文库》编委会

顾 问 陈 来

编委会主任 朱崇实

编委会副主任 陈支平 陈武元

编 委

朱崇实 朱汉民 朱杰人 周桂钿 陈支平 陈武元 吴 震  
李甦平 蔡方鹿 何 俊 田 浩(美) 吾妻重二(日)  
井上厚史(日) 何乃川 高令印 刘泽亮 乐爱国 杨立华  
姜真硕(韩) 苏费翔(德) 杨柱才 徐公喜 方旭东  
傅小凡 杨祖汉 杜保瑞 曾春海 吴光辉 谢晓东 朱人求

主 编 朱人求

副主编 刘泽亮 乐爱国

# 朱子学的精神与未来

——《朱子学文库》序

陈 来

在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如果说孔子是上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那么，宋代的朱子就可以说是近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朱子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学者，后人称其学术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在南宋以后，朱子和他的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社会文化影响甚大。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朱子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七百多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哲学。不仅如此，《朱子小学》《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家礼》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礼仪也日益成为东亚民众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朱子学因之成为近世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学仍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朱子家礼》在韩国、中国仍然发挥着它的部分功能，韩国和中国每年都会举行朱子祭礼来缅怀朱子的丰功伟绩，朱子学仍然存活在我们身边，仍然是我们重建精神世界的活水源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换言之，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未来精神世界的建构？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意义。

## 1. 文化传承

朱子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古代文化做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辑与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

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的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贡献，是近一千年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延续民族文化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重建社会价值的意义。应当学习朱子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抱负和努力。

## 2. 主敬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讲，敬畏感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从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

## 3. 学习精神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强调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最大的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属于“大学”，所以朱子学几乎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 4. 教育理念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当代大学通

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的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这些思想都是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 5. 实践哲学

朱子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更为强调实践，这种对实践的强调，特别体现在朱子一贯提倡的“知行相须”“力行为重”上。照朱子的讲法，致知与力行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但论先后，知在先，行在后。论轻重，力行为重。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一定能付诸实践、表现于实践。这种精神合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当代哲学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关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 6. 化民成俗

朱子的儒学思想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所以，其论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天性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伦尽职、尽力尽心。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蒙童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以及《家礼》等，在社会上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行，对形成文明的社会礼俗，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近百年来，我国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有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21世纪以来，朱子学研究开拓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如对朱子的易学、朱子的“四书”学、朱子的工夫论、朱子的经学、朱子的经典诠释、朱子的文学、朱子的自然学，以及朱子后学的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朱子礼学的当代社会实践研究等，都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种研究的多元化和广泛性在宋明理学其他大思想家的研究中（如陆象山、王阳明）是很少见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对朱子学的研究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的整体，我们今天仅仅是对于朱熹本人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如何发展朱子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的把握和处理朱子学材料的水平，关注较大范围的哲学思考，仍是朱子学研究应当持守的层面。在朱子后学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发展，只是总体上比起阳明后学的研究来还很不够。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的朱子后学的重要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果完成这些工作的话，对于学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建树。我们应当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朱子后学的研究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进一步说，朱子后学，若只限于一传二传乃至三传的意义，还不能穷尽“朱子学”的范围；从更广的朱子学的角度看，元明清的朱子学家思想群体都应有规划地一步步地开展其研究，成为体系，使“朱子学”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历史得以呈现，使“朱子学”的研究更加丰满。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研究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今后我们要大力提倡和发展第二、第三层次的朱子学研究。

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地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相同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风景。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真空，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给予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

反观近世东亚的朱子学（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研究，后来因学科目录中原有的“东方哲学”不再存在，使得相关研究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应继续努力加强其研究。近十年来中国台湾学者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对韩国朱子学加强了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湾朱子学界近年普遍出现了的对牟宗三先生朱子研究范式的一些反省和讨论，也促进了朱子哲学研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的开展，并将推动整个朱子哲学研究的深化。

最近，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朱子学会积极吸纳全球朱子学专家和学者的最新成果，拟用5年时间出版30册左右的大型《朱子学文库》。这是继20世纪日本发行《朱子学大系》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朱子学著作的大集辑，文库的作者群来自全球各地，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内容也以东亚朱子学研究和全球百年朱子学研究为主，我认为，这将是21世纪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老一辈的邹永贤教授、

高令印教授、何乃川教授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邹永贤教授主编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论丛》，在学术界影响颇佳。高令印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朱子学研究，其著作《福建朱子学》《朱子学通论》等在朱子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作品《退溪学与东方文化》《朱熹事迹考》被翻译成韩文，为韩国朱子学研究者所重视。200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复办，复办后的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组织校内外相关科研队伍，在开展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推动朱子学、海峡两岸国学研究与互动交流方面，成绩突出。近五年来，先后举办（包括联合举办）规模较大的国际和海峡两岸朱子学研讨会六次，出版朱子学研究专著、译著十余部。2011年9月，朱子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创办《朱子学年鉴》，组织举办多次大型国际朱子学会议，团结了一大批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引领朱子学研究走向国际化，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2年和2013年，厦门大学分别获得“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两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朱子学文库》，它也标志着厦门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朱子学研究的中心。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们坚信，发展朱子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加强规划，抓紧开展，促进国际交流，利用目前重视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使朱子学的研究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是为序。

## 蒙培元先生序

林振礼同志积二十年之功，完成了这部朱子研究的厚重之作，要我写一篇小序，我不能推辞。

作者在研究、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信或电话的方式与我讨论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范围之内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是那样认真，决不轻易放过，总要追究到底。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我除了从他那里知道很多有关朱子生活实践方面的知识之外，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这个急于成名的时代，还有像他这样孜孜不倦、埋头耕耘、披荆斩棘、持之以恒地研究学问的学者，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

这本书并不是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但是却洋溢着理论探索的精神和理论分析的气息。这本书也不是编年式的传记著作，但是却对朱子的人生经历有真实的描述，对朱子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会。这本书是深入到朱子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对其人生和思想进行微观研究的独特之作，也是作者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之作。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逸事，也有迄今未曾涉猎或“语焉而不详”的学术问题。

这是一部史实考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学术著作。他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哲学理念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将理论学说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将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在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和比较的过程中，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朱熹，并与之展开对话。这种研究方法，拉近了今人与朱子的距离，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理解朱子其人其学，同时又有很强的历史感。

要从事这样的研究，当然不能只在书斋中去完成，而要进行大量的野外作业。为了考证朱子的有关经历和事迹，作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到各地去考察，收集各种资料。他曾亲赴朱子当年从政与讲学的湖湘地区，

两次到朱子祖籍江西婺源，三次登临朱子办学的赣南、庐山，八次踏访朱子最喜爱且居住最久的武夷山。每到一地，他都要仔细寻访朱子的遗迹、遗物和遗墨，收集各种民间传说和地方志，甚至向当地老人询问各种习俗，从而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精神，是他能够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要保证。

他所收集到的各种宝贵资料，构成了这部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比如他第一次发现了朱子在庆元年间的手迹，再与文献、方志互证，对于搞清朱子在“庆元党禁”中的实际处境及其思想活动，提供了过硬的第一手资料做依据，对朱子的研究就深入多了。

但是，实际考察和文物收集，虽然是他独有的优势，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用力最勤而为之不懈追求的，还是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在这方面他广泛地吸收了今人的研究成果，但又不是轻易做判断、下结论，而是在涵泳朱子著作的基础上，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境出发，从每一次历史事件入手，透过朱子的实践活动，剖析其思想形成的条件和历程，在相互比较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此书不是对朱子生活经历的一般叙述或逸闻逸事的描写，而是通过朱子的实践活动展示其内心世界及其理论学说。“情境意识”和“实践意识”是此书的最大特点。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都是在具体情境与实践活动中阐明他们的学说的，每一个概念、范畴，都不是在纯粹的“理论沉思”中形成的，因而不是形式的、抽象的，而是有实际内容的。朱子也不例外。此书就是在这一思路之下写成的。

比如，朱熹的“中和”新旧说，是学者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它标志着朱子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但是，朱子为什么从“中和旧说”转变为“中和新说”？这种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其意义何在？学者们通常都是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解释（包括笔者）。作者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展开研究。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同时，更重视朱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实践活动。具体地说，他是通过朱子38岁时的湖湘之行，第三代主战派的学术集会，苦参“中和”的经历，说明其由“旧说”向“新说”升华的

内在联系。他既不取牟宗三先生的“别子为宗说”，亦不取金景芳先生的“程朱悖谬说”，而是吸收任继愈先生的“文化嫁接说”，使其更能接近朱子诠释《中庸》的历史实际。同时又参照某些学者（蒙培元等）关于情感哲学的观点，阐明朱子“心统性情说”的理论内涵，使朱子“中和新说”的意义得以彰显。这是从具体情境和实践出发，从方法上解读朱子的一个突出的例证，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部著作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理解朱子的许多新空间，体现了作者敢于言人之所未言的探索精神。“朱子的风水观”“朱子与摩尼教”“朱子在民间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节，就是其中最有特色、最有突破的成果。作者从逸文考辨和野外调查开始，进到生态、宗教和美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填补了朱子研究的许多空白。

“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也为一些思想家所重视。但是，过去一律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因而很少有人研究。其实，“风水”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态问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作者根据朱熹的有关资料，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考证和理论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使他成为我国研究朱熹风水观的最早、最重要的学者。

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是涉及中外文化关系的一个极有意义、极有趣味的问题，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无人进行研究。今天，摩尼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泉州仍保存着一座该教的寺庵。这为研究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陈荣捷教授来大陆，走访并收集了有关朱子的遗迹和资料，写成《朱子新探索》，其中也有“魔”之讨论，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未能继续研究，故只讨论朱子知漳州时“禁魔”一事，并且认为，朱子所禁者，为佛教而非摩尼教。作者根据相关资料，重新考证了摩尼教在泉、漳一带的传播情况以及朱子与之有关的行踪与言行，认为朱子所禁之“魔”正是摩尼教而非佛教，并进而提出“仕泉偶涉，知漳则禁”的结论，真可谓“石破天惊”。他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要推翻这一结论，则需要

花更大气力，提出更有力的证据。

历史上的朱子与民间传说中的朱子是不同的，“道学化”的朱子和人性化的朱子也是不同的。但是，二者同时存在于福建一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后者虽不是“历史的真实”，却活在人民的心中。作者对于大量的见诸笔记小说与口头传说中的逸闻逸事，给予了高度重视，作为俗文化的重要资料，与正史记载互相参照，互相比较，从不同层面说明朱子人格形象的多重性，赋予其新的文化意涵，为重新解读朱子提供了新的视角。

实际上，书中的每一章都有新材料、新见解。诸如“考评”“杂识”“出版”“教育”以及“逸文辑录”等，都是作者辛勤耕作、呕心沥血之所得，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的价值。这些价值将随着朱子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呈现。当然，其中的某些见解，不无可商榷、可讨论之处。但这都是作者独立体会出来的，不是轻易得出的，更不是简单的概念推演所能做到的。

作为一部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著作，此书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的特征，但是，其中包含着普遍的文化价值。正如朱子学被称为“闽学”，其影响则不止于中国，而且及于东亚地区一样。全书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但是，能从细微之处见其全豹。这正是此书的一大优点。

读此书者，必将得到享受。

蒙培元

甲申年季夏于北京

## 洪辉煌先生序

林振礼教授早年（1999）出版的专著《朱熹与泉州文化》，虽然只是七万多言的小册子，但是内容涵盖书题相关诸多方面的史迹史实，资料翔实，论从史出，打开了朱子思想与地域文化课题“一个别开生面的新视角”（何乃川），是新时期以来关于泉州“二朱过化”事迹考评的集成之作。嗣后，他踔厉风发，开阔视野，扩大成果，于2004年完成了熔实际考察、文献搜集与理论阐释为一炉的三十万言《朱熹新探》。哲学家蒙培元先生慨然为是书作序，高度评价——

这部著作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理解朱子的许多新空间，体现了作者敢于言人之所未言的探索精神。“朱子的风水观”“朱子与摩尼教”“朱子在民间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节，就是其中最等特色、最有突破的成果。作者从逸文考辨和野外调查开始，进到生态、宗教和美学诸多领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填补了朱子研究的许多空白。

《朱熹新探》标志作者的朱子思想研究达到了新高度，进入了新境界，也使他成为泉州学界研究朱子的重要学者。

林振礼教授始终抱持“为世界性朱子学研究的百花园增添一片绿叶”的初心，未曾停歇探求路上攀登的步伐。多年来，每有与朱子学有关联的省市学术研讨会，多能读到他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2015年他到龄退休，被推选为泉州孔子学会副会长，我与他又有共事交流的机会。传承朱子文化，泉州应该发挥独特优势，我向他提出增订《朱熹新探》的建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给我写了封信，谈增订稿拟增补的内容和结构框架。特别提到将会彰显以下诸方面新意。一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视角，着重写出泉州社会对青年朱熹的影响，



揭示朱子理学产生的社会原因。二是将朱熹置于多元文化接触视野中进行观照。不止于谈朱子与禅道的关系，而要进一步从“赵令衿案”揭示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抉发朱熹之于摩尼教，仕泉偶涉、知漳则禁的思想轨迹。三是以朱子理学阐发泉州关岳信仰。四是探索朱熹“湖湘之行”苦参“中和”的政治原因，彰显“中和新说”之于情感哲学的重大意义。四是以新发现庆元间朱熹录唐代诗人李群玉《言怀》诗手迹，进一步追寻朱子在“庆元党禁”期间的行踪。五是详解朱熹的堪舆思想（风水观）。六是评价作为编辑出版家的朱熹。七是考证辨析朱熹与梁克家相知相敬的关系，以“昔岁调饥政”，纠正流行朱著诸版本悼梁克家诗“几岁调娱政”的舛误。八是重新考证朱熹仕泉期间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阐述朱熹往见大慧禅师的思想史意义。九是深入考察庆元间朱熹与留正的交谊。十是竭尽全力，对朱熹仕泉逸文、事迹搜集稽考几尽，辨析之细，有如把“千寻瀑布如飞练，一簇人烟入画图”的著作权归还晚唐诗人韩偓。

经过近两年的潜心著述，增订稿顺利杀青并列入《朱子学文库》出版。我以近水楼台之便得以先睹为快。我认为，作者很好地实现了原初的构思设想，其中有三方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是作者增补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论述。全书不只是篇幅的扩张，而且是质量的提升，内容更为充实饱满。二是作者把朱熹与泉州文化的不解之缘放在他的一生中审视，与其不同时期的思想行为相联系，既让人物的思想逻辑更明晰，又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三是深入考察朱熹与闽南泉州多元宗教的关系，得出了“兼融而非宽容”的结论。“兼融”是指当朱熹在建构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时，他对多元宗教采取的是兼容并蓄、改造吸收、自我更新的态度。“不宽容”是指当宗教活动严重触犯伦理，危及社会安定时，作为成熟的政治家，他则是防患未然，毫不姑息手软。这部分应该是全书最具学术创见的内容之一。总之与初版相比较，增订本的社会背景更为宏阔，地域文化特征更为鲜明，人物的思想内涵更丰富，篇章结构也更合理。作者画出了一幅朱熹在闽南泉州可读的精神地图，也为